

促使佛教的普遍联系理论、众生平等的生命尊严、以及无情有性的信仰及其实践方式,既是当代中国人间佛教对待生态文明问题的基本方法,进而基于宇宙社会、万事万物本质同一、平等而无高下优劣之分的价值态度,整体地转换成为生态文明信仰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实践结构。人间佛教通过生态文明问题的面对和处理,实乃人间佛教进入社会、关注社会、服务社会、弘法利生的新路径与新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为人间佛教那种以财物捐献的单纯方式来服务社会的简单方法,从而使人间佛教陷入一种残补型、边缘性的服务方式。当代中国人间佛教,如果能够从生态环保、生态文明的问题出发,即能够把人间佛教的实践方法,引申到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保守心态及其社会文化批判,以一种社会价值系统的独立方式再度进入社会,对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文明建构、生态危机问题,提供若干实际有效的解决方法、改变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认知方式、把生态文明建构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生态文化信仰,那么,当代中国的人间佛教就有可能真正地深入了人间,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主要构成。

总之,这次会议,是中国佛教界的一次思想认识的提升,通过从理论上来探讨佛教与生态的问题,也就更好地将佛教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为未来的佛教走构建和谐社会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

广西“西山论坛·佛教文化暨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思 言

2008 年 11 月 6-7 日,由广西贵港高政府举办,桂平市政府协办,西山龙华寺承办的“西山论坛·佛教文化暨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桂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学者黄心川、楼宇烈、杨曾文、陈兵等知名学者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 30 余篇。与会代表围绕巨赞法师与佛教和广西佛教两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代表指出,巨赞法师是我国当代佛门的著名僧人,著名学者,也是新中国佛教的缔造者。巨赞法师一生曲折坎坷,但是他信仰不改,忍辱负重,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佛教徒的楷模。巨赞法师国学素养深厚,佛教理论教义娴熟,诗文清雅,著作等身,在中国佛教界里名列前茅,影响深远。巨赞法师爱国爱教,忧国忧民,关心佛教的前途,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改革,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呕心沥血,终身不渝。纪念巨赞法师,也就是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发展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人间佛教所继承的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精神。

代表对巨赞法师的思想和他的佛教新运动主张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 20 世纪整个中国佛教的变革,经由太虚法师的三大革命、巨赞法师的两大主张以及赵朴初居士的三个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

究与国际交流)之间的承先启后,已经在人间佛教——人间化的基本逻辑展得以充分地展开,基本上是从“人间化”走向一条“社会化”的变迁路径。巨赞法师佛教改革思想的发轫期,求改革于救亡之中,注重于佛教信仰的应时与救世,希望以佛教菩萨行济世救亡,进而明确提出了“生产化”与“学术化”两大主张,直接承继了太虚法师发动的佛教改革思想。他提出僧伽“学术化”的建议,则是为了发扬中国佛教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引导僧人勤奋学习,开展佛学研究,以提高僧众的素质和扩大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良好影响。从历史上看,“新佛教运动”一直是传统性的存在。从现实上看,“新佛教运动”更是方兴未艾的现象。“新佛教运动”的实践是新学的尝试、佛教组织的创立,关注“新佛教运动”在抗战救国与文化建设中的所能够发挥的现实力量。但是也有人认为,巨赞法师关于僧制改革的论述较诸虚大师更为激进,因而也更多空想成分。其中思想上的缺陷也惊人的一致:都漠视守旧僧侣的主体性,缺少民主精神和程序正义观念;对于政治力量介入僧团事务可能引起的复杂纠葛,特别是佛教主体性缺位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足够的自省,以至于天翻地覆的政治巨变之后,本来为“佛教改革”张本的新佛教论述,一度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替“改造佛教”乃至压制佛教的政治运动辩护的说辞,但续佛慧命、佛化中国的强烈淑世情怀,使得它最终还是以高扬佛教的主体性作为自己的绝唱。

巨赞法师以佛家的心胸、儒家的智慧、道家的超然治学,是巨赞法师国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他所观照的国学范围之广,不仅在僧界,即便是整个近代思想文化界,也堪称翘楚。巨赞有强烈的淑世、救世情怀,对于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的考虑始终比根本问题的解决排在更优先的问题。在治学上面,他注重佛学和外学的圆融,广泛涉猎世界学,力图使得佛教与现时代的方方面面重新发生意义的关联,以此作为佛教回应现代性的挑战,重建佛教存在的正当性乃至重返文化建设的领导地位的必由之路。而吕澂、印顺则更强调对佛学根本思想上作一番激浊扬清的工作,通过驳正和剔除佛学发展流变过程中的种种扭曲、蜕变,来“畅佛本怀”,彰显佛教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正本清源的思路。巨赞法师不赞成吕澂先生将“本寂”与“本觉”说作为两种截然对立并且前者为“真”说而后者为“伪”说的观点。他提出,印度佛教心性思想“侧重于”“本寂”或者说以“本寂”为主流而中国佛学以“本觉”为主流的观点,不存在中国和印度佛教在心性问题上截然有别的事实。与会学者们尤其肯定,抗战广西佛教事业是巨赞法师与道安法师实践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念的积极举措,一次成功尝试,属于中国抗战文化的一部分,应该载入史册,值得发扬光大。

这次会议广西的学者提交了不少具有新意的成果。学者指出,广西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其渊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苍梧太守牟融曾经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思想相融和的先驱之一。结合文献记载和东汉至南北朝早期佛教文化遗物的考古发现,可以推测大约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经从印度通过海路传到了广西地区。东晋时梧州已建立了广西第一座佛教寺院。隋唐以后,广西的佛教一直在蓬勃发展,桂林是我国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是全国高僧大德向往的佛教圣地。唐天宝八年(749),鉴真和尚从雷州到达桂林,在桂林的开元寺、监山寺等布经传法。唐代开元年间,禅宗南派创始人慧能大师的部分弟子到广西建寺传经。唐武后颁《大云经》,柳州市由此创建大云寺。从北宋后期的绍圣年间,佛教开始传入宜州。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至宜州时,称西竺寺规模之大为“粤西所仅见”。清康熙年间,广东南华寺石峰韬和尚和普明和尚先后驻锡桂平龙华,开山扩建,使之初具规模。两人均为曹洞支脉,自此龙华首开曹洞宗风。民国十年(1921)

十月,孙中山先生慕名游览了桂平西山,并捐赠资费兴建洗石庵。近代以来,除了巨赞法师以外,广西籍陈铭苏将军也是当代中国最有名的佛教界人士。陈铭枢曾给毛泽东上书三封,讨论佛教改革,在当时佛教界里影响很大。

学者认为,广西桂林拥有早自南朝下至明清的古代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深刻地反映了唐代以来广西桂林佛教发展的历程,而且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佛教发展提供了重要史料。桂林石窟造像虽没有龙门、云冈石窟造像宏大,却不乏南方的钟灵毓秀,玲珑精致,与桂林独特的岩溶地貌山水环境十分和谐。石窟造像的共同特征是:面部造型丰满,耳垂至肩,宽胸细腰,袈裟轻薄贴体,斜襟飘逸,神态安然温和。广西桂林石刻造像在大时代审美特征基础上又有着自身的特点,诸如西山石窟造像多采用薄雕与阳文线刻技法,线条活泼明快,是中唐以前的作品。骊马山 23 尊石刻造像多采用薄雕与阴文线刻技法,脸庞丰腴,秀眉凤眼、体态修长、袒胸露臂,神态端详,具有强烈的佛像表现力和唐代风格。伏波山石刻造像身材清秀、人物面容慈祥、袈裟轻薄、线条流畅,多为晚唐风格。叠彩山石刻造像具有明显的宋代特点,人物造型雕刻较粗糙,特别是脸型瘦削、且神情忧郁。此外,还有学者介绍了广西佛寺历史上的铸钟和寺院建筑的研究,以及当代广西佛教寺院的重建工作等内容。

学者说,《理惑论》的本身说明中国佛教初传,实况是先海路后陆路。《理惑论》与现存史籍互订,可补正汉末岭南区域史。牟子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以佛教为本来融通三教。他的策略非常清楚,即拉拢儒家,尽量不和儒家发生正面冲突;靠近道家,以老解佛,强调佛教和道家的一致性;攻击道教方术,猛烈批评长生成仙的荒谬不实。《理惑论》文本作为一种“文化真实”或“宗教真实”,这是无可怀疑的。《理惑论》模式之“理惑”二字正体现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体现的是代表佛教的牟子出面回答,清理疑惑,其表达方式是自问自答式,重在向其他文化背景的中土人士解释本教的基本立场,是宗教文明间自发的平等对话

总之,本次会议是我国广西佛教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学术会议,对促进广西的佛教研究和提升广西佛教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佛教界正在兴起办文化和搞研究的高潮。广西佛教界人士积极参与时代潮流,贵港市政府和桂平市政府注重地方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在广西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广西佛教的不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活动在广西举行。

(作者思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